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一)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一)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共党史专题讲义

(一)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中共党史教研室 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本社内部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0.75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3,000 册数：15,700
统一书号：11011·102 定价：1.00元

说 明

本书原是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进修班的教材，在一九七六年开始编写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于一九七九年作为校内用书，印了第一和第二分册。现在，为了适应党史专业课教学的需要，我们又对专题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和补充，绝大部分专题在原有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有的是重新编写的，并增加了部分新的专题，作为教学参考材料之一正式出版。

本书是以专题的形式编写的。它以各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为主线，各自独立成篇，自成体系；但各个专题之间又彼此衔接，互为补充，详略互见。各个时期专题多少不等，一律按时期分编为一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编为四个分册。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研究不够，对专题的编排，理论的分析，材料的取舍运用，以及文字的修饰等等，都还存在很多缺点或错误，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写和修改过程中，中共党史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和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的部分教师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一次参加本分册的编写和修改工作的有：张培森（负责第一、三、七题）、王家勋（负责第二、八题）、肖效钦（负责第四题）、程璇（负责第五、十题）、钱月香（负责第六题）、清庆瑞（负责第九题）、戴鹿鸣（负责第五、八、十一题）等同志。全书由戴鹿鸣同志负责统编，经何东、王洪同志审阅和朱菊卿同志统一校订。

中共党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1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29
五四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55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党的纲领和策略 的制定	85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统一战线中争夺 领导权的斗争	119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149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早期发展	179
北伐战争	201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231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 的干涉	269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发展及其危害	295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两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它最终失败了，于是有五四运动的爆发。同样，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原因，五四运动则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是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就是在这个历史转变过程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他还说，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清楚。因此，对这两大革命运动作一个简单的阐述是必要的。

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写下了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光辉篇章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清政府军队中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一批士兵和下级军官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了全国的响应。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

王朝迅速解体，终于被推翻了；中国的共和制度第一次在这个革命的高潮中产生。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古老的中国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权不断丧失，中国人民陷于日益穷困和痛苦的境地。仅就一九〇一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向外国赔款一项而言，就达白银四亿五千万海关两，^①赔款期内每年的利息尚不计算在内。大量的赔款和主权的丧失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它还顽固地拒绝任何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和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日趋激化。当人民无法照旧生活下去，而反动统治者也无法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推翻这最后一个王朝的一场革命就成为不可避免。

早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就同时兴起了两派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一派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一派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改良派企图依靠清政府本身，来实现一些为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改良，而孙中山则坚决主张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改良派第一次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起了最初的启蒙作用。但是，他们企图自上而下推行的维新运动，却很快遭到了清朝顽固派的镇压。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的革命立场更加鲜明，而且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倾向于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的。孙中山团结各地的革命分子，于一九〇五年建立了著名的革命团体、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

① 参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〇〇五页。

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革命纲领。同盟会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相号召，在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革命党人举行了多次的武装起义，许多革命家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邹容、陈天华、徐锡麟、秋瑾、林觉民等革命烈士的爱国牺牲精神，大大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热情。起义虽然一次次遭到了失败，但是在群众中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在一九一一年遍及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争路风潮中，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包括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在内的普遍反对，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四川保路斗争，更是对辛亥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武昌起义的基本力量是湖北新军。革命党人不顾反动派的压迫，在新军中进行了长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了新军中的大部分士兵。因此，在起义前夕，尽管革命领导机关全部遭到了破坏，革命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仍然发动了起义。革命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统治了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反动政权就土崩瓦解了。

在领导这场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始终是革命的旗手。他在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阐明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他为同盟会制定的政治纲领，就是以三民主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民族主义所宣布的目标，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民权主义的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而民生主义的目标则是“平均地权”。孙中山的这套政治学说虽然对辛亥革命起了组织和动员作用，但也存在着根本的弱点，那就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缺乏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他的所谓“平均地权”也并非让农民“夺富人田为己有”，而只是由国家“核定地价”，按定价给予原主，尔后由于实业发展地价上涨部分则归国家。这是孙中山目睹

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为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而提出的带有主观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理论虽然带有上述的弱点和空想的色彩，但是它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它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因而不但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劳动人民的欢迎。列宁对这个纲领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①。孙中山的纲领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新兴阶级的特点。正如列宁当时所说，它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学说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逐步扩大它的影响的。他在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斗争中，高擎着十分鲜明的民主革命旗帜。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所代表的改良派堕落为保皇党，进一步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争夺阵地。他们散布“革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会引起内乱和瓜分”等荒谬论点，妄图破坏革命。在这股逆流面前，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坚决地和改良派开展了一场大论战。他先后派人在香港、檀香山、旧金山和日本等地创办报纸，开展革命宣传，同时也号召国内各地革命组织，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四页。

广为创办报刊，共同对改良派进行思想和理论上的斗争。当时，在国内外卷入这场论战的报刊达数十种之多。孙中山还亲自撰写许多文章，发表了一系列演说，痛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论。这场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七年的大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空前的。

正是在这场大论战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党得到了发展和巩固，他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得以系统地形成。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他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对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作了一个总的概括：“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①通过论战，革命的民主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影响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②。

孙中山在革命准备时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他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在南京召开的独立的十七省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告中华民国的成立，改用公历，以该年为中华民国元年，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

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短短三个月内，临时政府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法令。其中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的有：废除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版，第八六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一一页。

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在革除恶习方面的有：禁止赌博、缠足，下令一律剪辮等；在发展实业方面的有：鼓励私人兴办工商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临时政府还在同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全文分七章，共五十六条，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确定中华民国采取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制；实行责任内阁制。这个临时约法虽然是不完善的，其规定的民主权利也主要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它在当时中国是一部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的法规，有其进步的历史价值。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摧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当时清王朝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推翻这个王朝，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这场革命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使得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既然历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制度都可以打翻，那末再没有什么反动的制度是不能摧毁的了，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虽然这种思想解放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开端，但是，国内外反动统治者想要再在人们心目中树立对这种或那种反动专制制度的迷信，就十分困难了，民主的思潮从此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预言：“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①历史完全证明列宁的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三九页。

预言，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从袁世凯到张勋曾一再妄图复辟帝制，然而到头来都成了一出出短命的丑剧。

二、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辛亥革命虽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但终究是一次失败了革命，它仅仅赶走了一个皇帝，却并没有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继辛亥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在证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完全的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首先，革命党人对于帝国主义的妥协，差不多从起义军胜利时起就表现出来了。武昌军政府在其成立的第二天（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二日）就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馆送出了七年前同盟会在东京拟好的对外宣言，表示尊重各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十一月间发表的军政府《代全国国民布告各友邦书》中，再次表示：“殚竭心力，备尽各种之方法以拥护外人之利益。”^①可是帝国主义在所谓“中立”的幌子下，强行扣留关税，妄图从经济上打击和扼杀革命政权，不久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已经不可挽救之后，便转而竭力扶植袁世凯作为新的工具来破坏革命。

对于封建主义，当时一般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他们大多数人把清朝统治者看作唯一的敌人，而实际上他们自己有相当一部分人同封建势力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是，南京政府并没有准备

① 转引自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五八页。

实行，而且许多地方的革命党人在夺权之后，反而对农民运动实行了镇压，这就使得革命政权丧失了最广大有力的支柱。在革命党人一无铲除封建的决心，二无可靠支柱的情况下，只有向着封建势力实行妥协。窃国大盗袁世凯就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了革命党人的这些弱点，才得以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袁世凯本是清朝末年以训练“新军”起家，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个汉族的大官僚、大军阀，在辛亥革命前曾被清廷逐回原籍。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灭亡，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率领清军向革命军进攻。这时的袁世凯眼看看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浪潮已经不可抵挡，就打算牺牲清王朝，来维护整个封建势力，并实现其个人的野心。于是他一方面逼清帝退位，一方面逼革命党人交出政权。他阴险狡诈地向革命党人施展了反革命两手，一面进行武力进攻，一面又提出和议。而革命党人竟然在袁世凯的炮火胁迫下，于汉口外国租界里通过一个“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当时孙中山虽是公议的革命领袖，并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但是在一派“威与维新”的妥协潮流下，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就被迫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孙中山在退职之前，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等三项办法作为让位条件，认为这是实行共和的可靠保障。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袁世凯窃国成功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第一个明证。

其次，袁世凯取得统治权力之后，有些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看到革命落到如此结果，就变得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但是也有另一些人则认为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国会里争取多数。他们以为通过议会斗争，能够限制总统的权力，以便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特别热衷于这个方案的是同盟会一位实际负责人宋教仁，他的口号是“新旧合作”，“朝野合作”，

借以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以便组织责任内阁。他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且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得到绝对优势的席位，居然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统统拉进党内。这样一来，本来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就进一步变成了一个毫无战斗力的烂摊子。正当宋教仁南下到处发表演说，满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这位年仅三十二岁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突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车站遭到袁世凯指使的特务的暗杀。

袁世凯在制造宋案之后，接着就同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两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大借款。他利用这笔从帝国主义者手中借来的庞大军费和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原北洋军队，发动了铲除异己的反革命内战。

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之后，便立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没收了四百多个国民党议员的证件。不久，他干脆把国会也解散了。至此，宋教仁所幻想的议会内阁制完全宣告破产。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又一个明证。

然而在北洋军阀独裁卖国政权统治之下，孙中山却始终没有放弃民主主义的立场，一直坚持着艰苦的斗争。当袁世凯制造暗杀宋教仁案件，暴露其狰狞面目之后，孙中山于一九一三年七月，立即发动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涣散无力，军事上缺乏统一指挥，“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遭到失败。在失败的面前孙中山并不灰心，一九一四年七月为了集结革命力量，他在日本东京另行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这个政党由于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加上组织工作上的严重缺点，因而也没有能在反袁斗争中起到号召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自取灭亡之后，接着就出现了大大小小军阀各据一方的局面。一九一七年，孙中山为了反对北洋军阀

段祺瑞政府，从上海到了广州，建立起护法军政府。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但他所依靠的却是西南诸省的一些地方小军阀，他们和北洋军阀原是一丘之貉。因此，不到一年的时间，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就联合起来拆了他的台，孙中山终于被迫跑回上海。孙中山一时陷入苦闷孤独之中，中国革命道路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至此，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陷入绝境。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

旧道路的破产往往成为人们探索新道路的起点。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①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②。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先驱李大钊早先也是对资产阶级共和抱有期望的，然而，冷酷的现实促使他很早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③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后来在回顾自己当时思想变化时，曾经这样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许多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④新的觉醒往往是在旧的希望的破灭中产生的。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七页。

② 同上。

③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一页。

④ 见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解放日报》。

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正是从辛亥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三、军阀统治下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孕育着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

由于辛亥革命没有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所以，继清王朝之后，代之而起的仍然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在帝制失败中死去，国内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十分混乱的局面。开始北京政府名义上的总统是黎元洪，实权却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继承了袁世凯的全部反动政策，一开始就力图袭用袁世凯所篡改过的“约法”来组织新的独裁政府。后来他虽被迫宣布恢复一九一二年三月南京政府所公布的“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但到一九一七年五月，当国会拒绝通过他对德宣战的提议，并免去他的国务总理之后，他便唆使北洋系的各省督军，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这时安徽督军张勋便乘机驱逐黎元洪，拥前清废帝溥仪复辟。复辟虽然很快失败了，而段祺瑞则乘乱又当上了国务总理，并由冯国璋代黎元洪为总统，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举起护法的旗帜坚持斗争。可是拥护孙中山的南方军阀各有自身的目的，护法对他们不过是个幌子。于是，整个中国终于陷入了南北分裂、军阀混战的局面。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所实行的都是对内独裁、对外卖国的反动政策。在对外方面，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

的二十一条和一九一七年以后段祺瑞出卖主权的大借款，就是这种卖国外交的最突出事例。

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际背景是：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妄图独霸中国。这年秋冬之交，日本在对法、奥宣战的借口下，派兵完全占领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势力范围，并且扩大了占领地区。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进而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有：要求占有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各项权利，并将这些权利扩展到山东全省；要求独霸南满和东蒙；要求日本资本渗入汉冶萍公司，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要求中国政府将所有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最后还要求控制中国政治、财政、军事主权和警察机关，独霸军火生产，等等。^①日本在向袁世凯秘密交涉二十一条要求时，口头上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交换条件。袁世凯为了“黄袍加身”，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在二十一条要求上签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彻底暴露了袁世凯政府的卖国本质，也空前地加深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这个协定所规定的日本在山东的特权，是我国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主权问题遭到失败的远因。所以直接负责办理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当时先后出任驻日公使的陆宗輿和章宗祥，就成了广大群众切齿痛恨的目标，成了遗臭万年的卖国贼。

继袁世凯之后的段祺瑞，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和侵略中国的另一条走狗。在他一九一七年重新掌握实权之后，就向日本大借外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包括已付款和订约未付款的数字达五亿日元以上，其中仅已付款就超过清政

① 参看《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三五三页。